

《开平文史》第16辑 1986.12

目 录

爱国华侨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司徒赞先生事略

..... (归侨) 吴玉成 (1)

司徒赞先生追悼大会悼词..... (19)

《纪南堂诗词存稿》自序..... 司徒赞 (21)

《纪南堂诗词存稿》序..... 张国基 (22)

司徒赞诗词选..... (24)

南京长江大桥 南京中山陵

长沙第一师范毛主席读书处

悼念周恩来总理 悼念朱德委员长

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 七十书怀

舟次开平三埠镇 潭江大桥建成通车志喜

敬题陈毅同志诗词选集(手书影印)

司徒美堂史料四则..... 余 炯 (30)

司徒美堂与孙中山 司徒美堂与蔡廷锴

司徒美堂与杨虎城 报载：司徒美堂“死”两次

李宗仁先生给吴一飞（尚鹰）函（五封）

.....（美国）吴尚势供稿（38）

张天爵与开平一代文人张筱峰.....张池（48）

中国哲学家——美籍华人陈荣捷.....刘华（52）

谭邃将军传.....（台湾）群言（54）

邓旭初和上海交通大学管理改革.....邓源芬（58）

许公墨缘行述.....（澳洲）郑彦棻（64）

兴学育才 造福乡梓

李活森先生热心发展家乡教育事业.....梁杰仔（66）

粤中区抗日战争时期军政机关的交替经过.....彭秋平（70）

泮村灯会颂升平.....李思泉（77）

侨胞诗词.....（81）

（美国）邓伟运 （香港）张伯裳 （加拿大）关其福

（马来西亚）吴康 （澳门）冯刚毅 （加拿大）周兆安

（加拿大）黄名赞 （美国）李驹南 （美国）黄宗晃

（香港）关文清 （美国）关宝泽 （加拿大）黄国富

（美国）余宝嫦 （美国）邓世任 （美国）谭美贞

（美国）邓燮勋 （美国）林一峰 （美国）黄立儒

（美国）方池灼 （香港）方瑞灼 （加拿大）吴启芬

封面题字：梁福生

封面设计：周子义

爱国华侨教育家 社会活动家

司徒赞先生事略

(归侨) 吴玉成

司徒赞先生，是开平县侨居印度尼西亚著名的华侨领袖人物之一，他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艰苦备尝，为印尼华侨的文化教育，团结进步，中印（尼）人民友好事业，做了很多工作，作出了贡献。他们侨居印尼的数十年经历，是印尼华侨生活、奋斗的一个方面的缩影，是研究印尼华侨史的生动的、真实的事例之一。我写这篇史料，表示对他们的崇敬与深深的怀念。

司徒赞（子襄），是早年印尼华侨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爱国华侨社团的一位著名侨领；抗战胜利后恢复侨校的主要人物，也是动员华侨与印尼人民一起进行反侵略，争取印尼独立的著名侨领，作出贡献，载在印尼史册上。他是著名的爱国华侨教育家、华侨社会活动家。1960年归国后，为祖国的教育和科研事业，团结侨胞、归侨、侨眷，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加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

矢 志 向 学

司徒赞，公元1900年9月诞生于广东省开平县赤坎区永坚乡连兴里（深塘村）一个小贩家庭。家有曾祖母、祖母、

父、母和妹共六人，父炳华，字文绍，在赤坎镇卖瓜菜为生，母谢开，在家务农种瓜菜，生活清贫。八岁时，曾祖母、父亲不幸相继去世，遗下四口，全靠母亲撑持，更加困难。半年后，他的叔父司徒华从马来西亚回乡探望母亲，体察实情，答应支持照顾，使他能进本村私塾读书。司徒赞自幼聪颖好学，十岁，就能自写春联，贴于门口，邻里见其字清秀，备加称赞，并请代书。他手抄一本对联，一本木鱼书，很是工整。十一岁，读了三年私塾的司徒赞，诗词书法，均有基础。是年，他叔父请同村一位堂伯父回乡带他去南洋谋生，他饱含热泪，拜别了祖母、母亲及年幼的妹妹，飘洋过海，到马来西亚去投靠叔父。他叔父在巴生开设一间小木工厂，生活尚好。鉴于司徒赞年幼聪明，就送他进新开办的中华学校读书，下午则在华英书院学英语，课余补习中国文史。由于他勤劳好学，学业大进，成绩优异。十五岁小学毕业，他叔父原拟留他在木工厂学木工，但他矢志向学，要回国升学，得亲友、校董资助，乃得和两位同学回上海升学。初进上海公学，后到浦东中学，两年后以优良成绩考进南京暨南大学师范系，攻读教育学。他除了努力读书外，还经常为学校墙报投稿，发表自己的见解，颇得教师们称赞，并引起著名教育家黄炎培的注意。（黄炎培1917年任江苏教育会副会长时，曾受北京政府教育部派遣和林鼎华到爪哇调查教育情况，积极推动当地华侨教育事业的发展。）他见司徒赞等几位归侨学生成绩优良，特约见他们，勉励他们勤奋读书，更激励了他的上进心，坚定了事业心。1919年司徒赞毕业时，正值瓜哇文池兰中华中学委托暨南大学物色校长，学校和黄炎培就推荐司徒赞前往接任。黄炎培为他亲笔题词，勉励他要多为祖国宣扬文化，努力培育华侨

子弟。十九岁的司徒赞，从此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

苦 心 兴 学

司徒赞在文池兰中华学校主持了两年校政，颇受好评。在繁忙中，他还抽空编写出具有当地特点的第一本《荷属东印度地理》（1922年暨南学堂出版）。他在“自序”中述说编写此书的目的：“迈年华侨学校虽林立，而所用课本，皆取诸国内所用者，不能适合南洋情势……欲求改革，当自编辑特种教育用书始……”表现出一个青年教育家对改革华侨学校的胆识和勇气。黄炎培为他这本处女作写了封面，并题词“中和一致”，表示对他富有创见的工作的支持和鼓励。

1922年1月，司徒赞应聘前往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下同），担任爪哇最早创办的八帝贯中华学校（简称八华）的中学语文教师。但只教了四个月，即因学生风潮而自动辞职。随后，他应聘前往巨港，任华商总会驻会坐办，旋应苏门答腊巨港广东同乡要求，创办华侨学校，这是巨港最早创办的华校之一。起初，学生只有十三名，经费和设备都很困难，他不为困难所吓倒，苦心兴学，曾三个月不支薪水，直至学校经费有着才受薪，他为教育献身精神，难能可贵。艰难办学也磨炼了他的坚强意志。

1924年11月，司徒赞与刘金端女士结婚，刘金端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初级师范，应聘在该校任教，她积极支持司徒赞工作，并在日后始终密切合作。

1925年底，司徒赞回国省亲。1926年4月返印尼，在巴达维亚八帝贯任中华学校校长。1927年1月，应聘前往三马

旺，到指导全荷印华侨学校工作的中心领导机构“荷印华侨学务总会”任视学。时荷印各埠华侨学校已发展许多，为全面兼顾，改进教学，才有学务总会之组织。董其事者为郑坚成诸人，会址设在泗水。司徒赞任视学期间，发行教育月刊，自任编辑，颇为时人重视。因为当时是荷印华侨思想分化时期，表现在侨教方面十分复杂。司徒赞出任艰巨，但不怕困难，在复杂的环境中争取有利。先是公元1918年以后，荷人与我国争华侨国籍问题，而吾人则以为未决，在彼则以为华侨子弟之生长彼土者为其籍民，故其对华侨教育，则以使其思想荷化为目的，惟其结果，未达预期。曾受荷式教育之华侨思想，分为三派：一为国家思想，爱祖国热诚，不下曾受祖国教育者，发表言论，多铮铮有声；一为欲与土生荷人及土人之知识阶级造成一种印度尼西亚势力；一派盲从。影响所及，1927年菲律宾出版、许克诚之《三十年荷属华侨教育述略有段记载：“……其思想变迁及于生活者，则表现不能如前辈之俭朴刻苦；谋生则欲恃智力，不学前辈之勤劳，婚姻则习俗初改，反觉择人及对偶之为难，退婚者不少。此等子弟所受教育范围稍广，而又多为富厚之家，在社会上，渐占势力，其受高等教育，则常用非所学，生活方法仍多从事商业。本为思想统一之华侨，今起分化，对于荷属华侨社会，遂有趋向各异之势。既日复杂，而华侨思想，亦渐分为两派，竟有人主张改组华校，全授荷文，发言异常，令人惊奇，……所幸其提出之时，祖国革命胜利（引者注，指北伐战争）呼声日高，故除彼自办之巫文报为其辩护外，大为舆论所反对，及中华会开年会讨论之时，亦不敢对此有确定之主张矣，然此种思潮尚潜伏于一部分华侨心理中。”于是学务总会召集各校在爪哇泗水开教育会议，讨论侨学问

题。时适黄炎培南游爪哇，备受华侨热烈欢迎，司徒赞旧雨重逢，分外亲切，认为千载一时良机，乃偕黄炎培巡游各埠，宣传爱国主义教育，侨校应以祖国语言文字为基础，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于海外，所发言论，得大部分华侨拥护。

“吾族方兴，经此一激，华侨教育之新纪元，或即于以开端也。”（同上书）。司徒赞此次对印尼华侨教育之复兴与端正方向，是有功的。1928年1月，司徒赞回到巴达维亚，任《工商日报》主编，旋因健康关系，同年12月辞职。1929年7月前往巨港，任丹戎厄林爱群学校校长，将近三年。1932年2月前往新加坡，三月，在新加坡创办《新侨月报》，后因销路不佳，半年后停刊。十月再回巴达维亚，任《时报》主编，1933年4月辞职。五月，应文池兰中华学校董事会的邀请，重回故校主持校政。1935年7月，应巴达维亚广仁学校董事会邀请，出任该校校长。

热心侨教侨团工作

司徒赞出任广仁学校校长，是他人生征途上的一次重要转折。从此，结束了十年东奔西走的动荡生活，以巴达维亚为基地，努力从事侨教和侨团工作，成为印尼著名的华侨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之一。由于时势动荡，他四次进出巴达维亚，两次进出中爪哇，又先后到巨港、新加坡，八易其职，他与各地华侨社会和各阶层华侨人物有更多的接触机会，又增加了他对东南亚特别是印尼华侨社会的了解，为日后更好地开展华侨教育和侨团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司徒赞出任巴达维亚三大侨团之一的广肇会馆主办的广仁学校校长后，积极施展他的才干和工作经验。他努力整顿

校务，筹款加建楼房教室，延聘有教学经验的教师，使校务蒸蒸日上。初期，该校学生由幼儿班到初中有学生五、六百人，以后增至一千多人。学生不少是工人或职员子弟，他们家境贫穷，许多人付不起学杂费，为不使这些华侨子弟失学，司徒赞不但给予全免学费的优待，有时自己还解囊相助，表现出他关心贫苦华侨子弟的可贵品德。

1937年，司徒赞被选为巴达维亚华校教师公会主席。三十年代，印尼许多小乡镇的华侨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但这些华校缺乏经费，尤其缺乏师资，不少地方的校董前来请他协助解决困难。司徒赞不辞辛劳，亲自带领他们向商家募款，代聘校长或教师。为之应付缺乏师资之急，广仁学校还加办了师范专科班。由于司徒赞工作积极勤恳，关心各地华侨教育事业的发展，他连续被选为该会的历届主席，并获得该会颁发的“热心华侨教育”金质奖章一枚。他担任此职直至日本侵略印尼前为止。此外，由于他诚恳待人，善于团结各阶层华侨人物，他还被选为广肇会馆的文书主任、董事和副主席、广肇青年会顾问、中华总会文书主任、新明会顾问、养生院顾问等。

积极支援祖国抗日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海外华侨，群情激愤，同仇敌愾。司徒赞及其夫人立即投身于华侨支援祖国抗日的爱国运动中去。8月2日，巴达维亚华侨成立了“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前身是“华侨救国后援会，”因荷印当局害怕日本军国主义，不许使用敌对性字眼，故改用此名），向华侨筹募款项、物资，支援祖国

抗日。司徒赞被选为文书主任，参与起草签署一切文件工作，并赴各地发动募捐。他的夫人刘金端女士亦被选为该会妇女组织副主任，协助筹款和救济等工作。他们经常四处奔波，发动侨商、企业家筹募款项、药品、衣物，还以华校教师公会主席身份，发动教师、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向家长及侨胞募捐。此外，由柯全寿、洪渊源和司徒赞等人负责的一个特别组织委员会，负责购买急救药品、救护车，还组织医疗人员和汽车司机一百多人回国服务。自1937年7月至1942年12月，共募捐约五千万港元，及各类物资，先后寄至贵阳红十字会收转。

巴达维亚华侨慈善会成立后，跟着全印尼各大城市如三宝瓏、泗水、万隆、梭罗、玛琅等闻风而起，先后组织筹募慈善会。新加坡南侨总会成立时，司徒赞代表印尼全体华侨前往参加会议，并表示巴城华侨要举行月捐。陈嘉庚回忆录关于荷印部分有说：“七七抗战后，大中商埠组织筹募之慈善会，新加坡召集南侨代表开会，吧城、泗水、万隆及两三个中等埠，均有代表参加。唯常月捐，吧城承认国币三十万元。……万隆数万元……迨后吧城，万隆均如数履行，且或常有超过者……。荷印华侨一百六十万人，每月捐输平均国币一百六十万元，每人平均一元。”（引者按，当时荷印华侨号称三百多万，这指未计华裔华人而言）。荷印能有这些成绩，司徒赞是劳苦功高的。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印尼危在旦夕，荷印殖民政府为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曾向巴达维亚中华总会提出要求联合华侨力量，组织“抗敌后援会”，共同御敌，作为中华总会文书主任的司徒赞，负责起草了“抗敌宣言”。1942年3月5日，日军占领了荷印首都巴达维亚，9

日，荷印殖民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4月，日军开始大逮捕，数日间，4月4日司徒赞和爪哇爱国侨领及知名人士五百四十余人，以“敌性华侨”的莫须有罪名被投入西爪哇西冷狱中。司徒赞因曾起草“抗敌宣言”，不仅遭到追查殴打，备辱侮辱，而且惨遭抄家之祸，他多年珍藏的书籍也被悉数抄走。经过多次辗转迁徙，最后被监禁在芝马墟最大的国际集中营（当时陈嘉庚也住在离集中营不远之玛琅巴蓝街四号黄丹季住宅，因秘密无人知）。这个集中营以荷兰人居多，约九千余人，其次是华侨，再其次为英国人，此外还有俄、美、德、奥、法、阿拉伯和印度等国入，共约万余人，司徒赞和难友备受折磨之苦。1943年3月，刘金端及其友人也因暗中筹款接济国内派来的工作人员，为日寇发觉而遭逮捕，以“叛逆华侨”的罪名被日本军事法庭判处十年徒刑。夫妻两人因为抗日而双双投入监狱，使家中因“老燕未归雏燕苦”。司徒赞一家在日本侵略印尼时所受到的苦楚，也正是许多爱国华侨所受到的苦楚的一个缩影。

在苦难深重的狱中，司徒赞仍注重学习。他与三宝瓏慈善会主席张聪添先生（以中国人身份出任荷兰皇家顾问，实为荷印三百年历史所仅见，也是华侨在荷印政坛上最著名的人逮捕后不屈，将被处死，他曾做出惊人故事，日本人壮其勇，遂不杀，转入集中营。）互相学习，至出狱时，张聪添已能说流利普通话，学了中国文学且能写得很好的中国书法；而司徒赞亦已通荷文荷语了，真是难能可贵。

致 力 大 团 结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南岛重光。8

月27日，司徒赞从集中营被释放出来，恢复了自由。当时，司徒赞和华侨大团结，恢复经济，发展教育，使失学三年多的华侨子弟就读。司徒赞和数名教育家一道，在当地三大侨团（广肇会馆、华侨公会、福建会馆）的支持下，超越战前分帮分派办教育的格局，创办联合中学（后易名巴城中学），这是战后司徒赞的主要社会活动之一，也是他对华侨教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一个方面。出狱不久的司徒赞，以充沛的精力和饱满的热情，紧张地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10月15日，联合中学在还未有自己校舍的情况下，假广仁学校礼堂举行开学典礼，司徒赞以主席身份主持了有八百多名师生参加的激动人心的开学仪式。联合中学的创办，正如司徒赞所指出的，是“爪哇重光后巴城华侨大团结的表现，也是多年来吾侨理想中的产物”。

联合中学刚创办即录取了717名学生，10月24日，为满足外地求知青年要求，举行第二次入学考试，又录取80余名学生，一跃而成为战后巴城华侨创办的三大中学之一。因未有校舍，不得不借华侨公学为第一校，广仁学校作为第二校，宛朗岸中华女学校作为第三校。师生要往返来回上课，这确实是华侨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然而，由于教师认真教导，循循善诱，学生勤奋学习，团结友爱，又得到社会人士鼎力支持，校务蒸蒸日上。

1946年6月，主办联合中学的三大侨团决定无条件地将联合中学献出，交由中华总会文教部接办，使其成为华侨公立的中学。7月，改名为“华侨公立巴城中学”，简称“巴中”，成立包括司徒赞在内的、三十一人的筹委会负责改组工作，8月，改组工作完成，司徒赞出任第一任校长。

巴城中学成立后，面临很多棘手的问题，最严重的是校

舍问题，司徒赞付出了很大精力，依靠巴中董事会，成立建设委员会，以及学生自治成立的“协助捐校筹捐委员会”，发动学生走向华侨社会，开展每人至少募捐一百盾的“百盾运动”，司徒赞亲自前往三宝瓏和坤甸等地向侨胞募捐建校经费。

经过十年努力，至1955年10月，巴城中学孟加勿刹正校已拥有教室二十间，物理、化学、生物教室及实验室各一间，图书室、办公室、礼堂和篮球场各一座；它还拥有面积为九千平方米的古农沙里分校，计有办公室、教室、图书室共二十多间，师生宿舍一座，食堂一间。学生由初办校时760人发展为3283人（最多时期达3900余人）。还办了师范科和商科，教职员由初办时27人发展至119人。巴城中学能在短短十年中成为一所具有一定规模，并成为印尼最有影响的华侨中学之一，“这是与各方面的支持与爱护分不开的”（司徒赞语）。司徒赞由于对巴中的创办及其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在1955年10月15日巴中成立十周年的校庆纪念会上，被校董会授予“热心教育”的金牌一枚，以表彰他“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功绩。他担任巴城中学校长直至1960年初他回国定居前为止。

司徒赞长校的巴城中学与李春鸣、张国基领导的中华中学，在五、六十年代时期，是雅加达最负盛名的两间爱国中学，学生不仅来自爪哇，而且来自外岛各地，为培养华侨子弟、华校师资，传播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毕业生有的留在当地为华侨教育服务、或从事商业、工业，或考上大学，或到澳洲和欧美各大学继续深造。但多数学生都象万流归海那样回到伟大祖国母亲的怀抱，继续学习，并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出色的华侨社会活动家

司徒赞除了热心华侨教育事业外，还热心于华侨团结和公益事业，是出色的华侨社会活动家之一。不论是战前或战后，他曾经在许多华侨团体的负责人。1938年即被选为巴达维亚华校联合会主席，直至日本占领印尼。他曾担任广肇会馆的董事和文书主任，以后任该会馆主席。1945年8月17日印尼宣布独立后，荷兰殖民者不甘退出历史舞台，卷土重来，于是印荷双方在各地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各地华侨也因此遭到暴徒的抢劫和烧杀，半年之间，逃生避难来到雅加达的难侨达五万余人，司徒赞作为刚恢复组织的华侨慈善事业委员会的副主席和成立不久的中华总会副主席，立即投入了对这批难侨的安置和救济工作中。这时他一身两任，上午到联合中学，与同事们商议校舍和开学等事宜，下午则到总会处理难侨的救济工作；（为救济这批难侨，每月需筹款二十万盾）。司徒赞任劳任怨，颇得社会舆论的好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印尼华侨欢欣鼓舞。如何积极促进印尼与新中国建交，成为广大印尼华侨关心的一件大事。11月，雅加达华侨成立了“促进中印(尼)建交工作委员会”。次年五月，中国印尼建交，八月，上述“工作委员会”改名为“雅加达华侨团结促进会”，推举刘宜应为主席，司徒赞和杨新容为副主席。1952年4月，该促进会改名为“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称侨总），洪渊源被选为主席，司徒赞、刘宜应和吕俊诚被选为副主席，分别代表广肇、客家和闽南籍华侨团体。司徒赞还兼任侨总文教部主任。1955年以来他由于待人诚恳，作风正派，善于团结侨

胞，连续两次被选为侨总主席，直至1960年回国定居前为止。

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是当地最高的侨团组织机构，属下有十多个侨团，侨总主要致力于加强华侨团结，搞好华侨文教和福利事业，教育华侨遵守当地法令，移风易俗，搞好与印尼人民的关系，促进中印（尼）友好事业的发展。司徒赞作为两届侨总主席，为上述事业做了不少工作，作出一定贡献。司徒赞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1957年3月19日，他以侨总主席的名义，对雅加达《生活报》记者发表谈话，他呼吁：“为了祖国的和平统一，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我们华侨包括国民党人士，应该消除成见，团结起来，为促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而努力”。

司徒赞把爱国侨校和爱国侨团工作一起做，在开展爱国团结活动、维护华侨权益、争取印尼独立、加强中印（尼）两国人民友好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45年10月起，他任华校教师公会主席，又是华侨慈善事业委员会副主席，当时战后印尼侨校很复杂、混乱，大量战时失学的华侨子弟要求入校学习，印尼人民又要进行抗荷拒英的独立斗争，在复杂情况下，司徒赞历尽艰辛，应付万变，并培养了一批爱国华侨青年，作出了贡献。印尼独立后，颁布了排华法令，诬说侨校主要并不是使学生求得知识和学问，而且进行各自的政治宣传，对印尼治安有影响。司徒赞据理力争，以教师公会主席名义，说明侨校完全奉公守法，采用印尼文教部批准的课本等，那种“政治”论调，是企图将莫须有罪名强加在侨校身上。

新中国诞生后，侨校分为两种：一是爱国侨校，拥护新中国；另一种是为国民党分子所控制。司徒赞主张团结爱

国，1954年7月，台湾当局深感过去争夺侨团侨校不得人心，便派台湾救国联合会秘书董其芳亲临雅加达，指示召开“印尼华侨教育会议”，对当地侨教政策和活动，作新的策划和部署，竭力败坏华侨子弟到台湾升学。司徒赞多方奔走，组织力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华侨思想与侨校的倾向有些好转。1954年9月，印尼爱国侨校有一千间以上。印尼八大城市不完全统计，爱国侨校有125间，占71%以上。在教师公会主席司徒赞的领导下，爱国侨校开展民主爱国运动，如和印尼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人民青年）共同纪念国际学生节，或召开反殖民制度斗争的大会等。雅加达学联会和学生会与爱国侨团一起工作。各地华侨学生成立了统一的学生组织，如爪哇学联、苏北学联、雅加达学联等，还有学生会、少年儿童队、劳动服务团等，领导学生的课外活动，成为爱国侨团的助手，有的发挥先锋队作用。不但加强华侨爱国力量，且增进了中印（尼）人民的友好。

1945年10月底，荷兰的支持者英国，干涉印尼军民接受泗水日军投降问题，泗水人民与英国发生冲突，11月9日，英国诬蔑印尼军队杀害失踪的玛拉拜准将，向泗水人民下最后通牒，泗水人民不怕恐吓，翌日，英陆海空三军全面向泗水市进攻，泗水市军民立即投入英勇的保卫战，给敌人以严重打击。泗水抗英斗争与保卫华侨权益是分不开的，作为中华侨团总会主席的司徒赞，响应当地政府号召，迅即动员印尼华侨起来参加抗英斗争。当时泗水十一万华侨，有很多华侨青年拿起武器，与印尼战士并肩作战，还组织了战时服务团，进行募捐宣传、慰问伤员、接待难民、维持交通等工作。在方圆只有十多公里的泗水，城市巷战持续三个星期，可见战斗之激烈。泗水之役，牺牲华侨五千余人，华侨无私

支持，泗水人民有口皆碑。

1947年7月，荷兰军在美、英国支持下，向印尼发动所谓第一次警卫行动。各地华侨响应侨总号召，敌汽同仇，与印尼军民并肩作战，为印尼独立而斗争。荷军占领玛琅后，华侨又与印尼人民一道反抗荷军暴行。一位华侨被荷军无理枪杀，召开万人抗议大会，荷军派兵镇压，造成流血事件，当晚日惹电台广播表示支持。各地华侨也积极支持，很多地方的华侨工人、市民、学生还举行罢工、罢市、罢课和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侵略，支持印尼民族独立斗争。1948年底，荷兰对印尼发动所谓第二次警卫行动，举兵进犯印尼首都日惹，总统苏加诺、副总统哈达、内阁总理沙和尔等被俘，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动员印尼华侨筹款接济政府，后来哈达副总统曾亲自署名向华侨致信感谢。后总统苏加诺在访华时在广州曾对黄洁（印尼著名侨领之一、当时任广东省副省长）说：“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了你们的帮助，让我再次表示感谢”。1947年11月，印尼安塔拉通讯社分社长塔哈鲁打·阿赫默德在致新加坡南侨日报纪念特刊的贺词中说：“过去和现在，在印尼境内的华侨都坚决地支持印尼共和国政府，准备牺牲一切以对付侵略者，甚至因而牺牲自己亦所不惜”。1959年1月10日在雅加达卫戍司令部举行的赠送仪式大会上，侨总主席司徒赞代表印尼华侨，把一批价值二十三万盾的慰劳品交给印尼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鸭都·苏古尔。

印尼华侨对印尼独立，立下不少功劳，受到印尼政府和人民的赞扬。然而，印尼独立后，一部分有势力集团利用时机和政府一些法令，推波助澜，排华浪潮日逐厉害，司徒赞曾以侨总名义发表备忘录，给予有理有据的回答。1959年9月，司徒赞回国参加国庆观礼，曾代表印尼华侨向宋庆龄献

旗。在北京，司徒赞出于维护华侨权益的公心，对印尼某些有势力集团挑起排华，制造流血事件，发表广播谈话进行批评。11月16日返抵雅加达，即遭当地战时掌权者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拘捕，1960年1月，他与夫人被迫离开印尼回国。

爱国出于天性至死不逾

司徒赞回国定居后，得到党和政府很好的关怀和照顾。他被安排在广州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任副所长，兼暨南大学董事会董事，先后历任广东省第二届政协委员、广东省第三届人大代表、全国侨联委员、广东省侨联常委、广东省华侨投资公司董事、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为团结广大华侨、归侨、侨眷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加强爱国统一战线，继续发挥自己的光与热，作出了新的贡献。他还被选为广东省历史学会和中国亚非学会等学术团体的理事。

司徒赞以花甲之年，仍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办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这个成立不久的研究机构，首先他抓好该所的图书资料和设备的工作。一方面派人到京、沪等地购买一批有关东南亚史地、经济和华侨等方面的图书，同时他还献出一批自己珍藏的中外文书刊。他还利用自己在国内外的广泛社会关系，请有关人士捐赠有关图书。他打听到有的归侨、侨眷学生要出国，立即派人设法将他们的有关藏书买下。对一些残缺不全的重要杂志，想方设法购买补齐。作为暨南大学董事，1967年他曾函请印尼友好购买八部显微镜和一些科学仪器，赠送给暨大以充实教学之用。他重视提高研究和资料人员的业务水平，根据校领导